

# 吕德斯与西格追思

瓦尔特施密特 撰；刘 震 译

[译者按]上一辑《西域文史》刊登了季羨林先生的导师瓦尔特施密特为两位德国的西域研究开拓者——勒考克 (Albert von Le Coq) 与格伦威德尔 (Albert Grünwedel) 所撰的追思文。这一辑推出的是他对两位与之关系更加密切的师长——吕德斯 (Heinrich Lüders) 和西格 (Emil Sieg) 的追忆。前一篇发表在1943年的《研究与进展》(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总第19期的250~252页上,后收于贝歇特 (Heinz Bechert) 和基弗—佩尔茨 (Petra Kieffer-Pütz) 所编的瓦尔特施密特《短文选》(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 斯图加特, 1989) 第11~13页。后一篇发表在1951年的《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总第101辑的1H·2H页上,后收于《短文选》的第14~24页。

我们知道,吕德斯是德国最伟大的印度学家之一。陈寅恪先生曾经听过他的课,他也是季羨林先生最为推崇的学者;而西格是德国,甚至是世界吐火罗学的奠基人,季先生师从了他,也将这门学问带到了中国。留德期间所接触到的老师中,季先生与之感情最为深厚。吕德斯和西格无疑是德国文献学 (Philologie) 的杰出代表,从下文可以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文献学,那就是德国学派的文献学——广博精深的知识和视野,加上缜密细致的文本梳理,另外还有厚积薄发、谦逊勤勉的为人、为学方式。通过西格与列维 (Sylvain Lévi) 的论战,我们可以发现,德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差异,而这又同后来大行其道的美国学派,以及我国唯成果统计数据至上的学风那么格格不入。

勒考克与格伦威德尔从中亚归来,不仅他们自己从田野考察回到了书斋之内,而且他们带回来的大量文物也让德国的东方学家们,从吕德斯和西格那一辈文献学家开始,一代接着一代地坐在书桌前为之皓首穷经,这就是德国的吐鲁番学产生的缘起。

## 海因里希·吕德斯 (Heinrich Lüders)

远离其柏林的住所,在位于巴登维勒 (Badenweiler) 的一个偏远而安静的疗养院里,1943年5月7日,死神阎摩 (Yama)<sup>①</sup> 的使者来到了海因里希·吕德斯 (Heinrich Lüders) 的面前——这位于1935年退休的柏林大学 (Berliner Universität) 印度学教授,

① 印度宗教中的死神,相当于中国的阎罗——译者注。



溘然辞世。对一些年轻一代的德国印度学家来说,他是在国内外<sup>②</sup>皆被视为德国印度学的领袖人物、上师中的上师(*gurūtama*)、令人尊敬的大师。仅有一个由其近亲组成的小团体出席了在弗赖堡(Freiburg)举行的遗体火化仪式。

吕德斯于1869年6月25日出生在吕贝克(Lübeck)。他的人生道路将其引向了学人们孜孜以求的陡峭的最高峰。自从1909年起,他就是普鲁士科学院(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院士,从1920年至1938年,他一直是科学院的四位常务秘书之一;1924年,他被授予科学与艺术成就骑士勋章(Ritter des Ordens Pour le Mérite)<sup>③</sup>,1931年成为骑士团的次长,同年当选为柏林大学的校长,并于1932年获得了为科学和艺术而设的歌德奖章(Goether-Medaille)。他还曾是罗斯托克大学的名誉会员(1919年)、莱顿(Leiden)科恩研究所(Kern-Institut)的名誉会员(1928)、巴黎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的名誉会员(1931)、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1)和伦敦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名誉会员(1932)、无数科学院的外籍和通讯院士,并且自1922年起,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的代理主席。

诸多荣誉和身份见证了他的国际声誉,他曾是方家与同仁的一颗指路明星,而在大众中间,他的名字并不如其他印度学家那么为人熟知,因为[一般人]要了解其学问并非易事。印度学所有分支中的新知识源源不断地向他涌来,以至于他终身都耻于从事二手文献工作、撰写普及性读物和主编文集——除了有时做些报告之外。他的毕生巨著,正如他留给我们的,主要有两类:①细致入微的文献考据,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析问题,以严谨和紧凑的风格行文,其作品对读者的要求很高。②伴以大胆的想象的知识汇总,它既可以使得这位大师免于忘记各个知识间的宏观联系,又能让他时而在这个领域,时而在那个领域,进行开拓创新。

吕德斯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哥廷根(Göttingen),在那里,这位年轻的学者获取了成就其两项伟业——碑铭释读和印度史诗校勘的基础材料。当时他是弗朗茨·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的学生。基尔霍恩是印度语法和碑铭方面令人仰止的大家,他的学问一部分来自于印度本土学者——班智达(Pandit),一部分来自欧洲的教育。吕德斯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完全受到了他的影响。1891年,吕德斯因一篇获奖文章而博士毕业,基尔霍恩培养他从事印度碑铭的编订工作。从1896年起,他为《印度碑铭》(*Epigraphia Indica*, 简称为*E. I.*)杂志撰文,作出了很多贡献。这项工作的顶点是1912年*E. I.*

② 指德国——译者注。

③ Orden Pour le Mérite(“为了功勋”骑士团)为腓特烈大帝(1712~1786)所设立,是普鲁士王国外黑鹰骑士团勋章(Orden vom Schwarzen Adler)之外,所颁发的最重要的荣誉。该骑士团可上溯到1667年的雄鹰骑士团(Orden de la Générosité)。到1918年为止,该勋章一直颁发给军人,而后更名为科学和艺术成就骑士勋章(Orden Pour le Mérite fü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转而这两个领域的工作者,直至今日。

第十期中的一个附录《从最初时到公元4世纪除阿育王时代之外的婆罗迷铭文列表》(“A List of Brahmi Inscrip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about A. D. 400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soka”)。这一成果奠定了吕德斯作为碑铭学家的声誉,在其一生中,这一领域的工作一再使他着迷。

1895~1899年,他担任牛津大学印度研究所的助理管理员和图书馆员。1898年,在其完成在英国的任务之前,吕德斯以作品《关于〈摩诃婆罗多〉的伽兰他[字体]修订本(史诗研究I)》[*Über die Grantharecension des Mahabharata (Eposche Studien I)*]通过了其在哥廷根的教授资格考试。这位年轻的学者在文中展示了对这部印度巨大史诗的诸多问题的看法和压倒性的批判态度。他的作品催生了(后为世界大战所毁灭的)重修《摩诃婆罗多》的计划,这一计划将由国内外科学院共同主持,在吕德斯的领导之下。

1903~1908年,吕德斯起初以梵语和印度日耳曼语言学的编外教授,后以正式教授身份受聘于罗斯托克大学(Universität Rostock)。后来他又在基尔(Kiel)工作了半年。而后他去了柏林,这一职位意味着他学术视野的一个转折点和人生一段重要篇章,尽管他仍然没有放弃早年的工作领域。他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并在未来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学术成熟期之后,收获期接踵而至。

当时在柏林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das Staatliche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保存了一批写本,那是本世纪初<sup>④</sup>由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和勒考克(von Le Coq)<sup>⑤</sup>所领导的德国“吐鲁番考察队”(Turfan-Expedition)携回的,它们等待着被编辑整理。尽管大部分写本残破不堪,但它们幸运地遇到了吕德斯,对这项任务而言,他的碑铭研究工作是绝好的前期准备。拼接和释读写本残片这一艰苦卓绝的琐碎工作开始了,艾尔瑟·吕德斯(Else Lüders)夫人给予其夫君无与伦比的支持。吕德斯夫人也因此于1919年获得了罗斯托克大学的博士学位。对于重要的事物,吕德斯可靠的眼光迅速导致了诸多引起轰动的发现。被他所发现的《佛教戏剧残片》(*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证实了一种至今未曾预料到的印度人戏剧作品——比以前所有熟知的都早数百年,以及古代文学的方言形式[的存在]。二十年后,吕德斯在《童受的〈大庄严论经〉残片》(*Bruchstücken der Kalpanāmaṇḍikā des Kumāralāta*)中,发现了这部[佛教]作品,之前我们仅仅知道,它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佛教诗人[但未有作品存世]。此外,他还主持和推动了普鲁士科学院东方学委员会(Orientalische Kommission der Preuß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进一步细分工作。在他博学的妻子的协助下,梵文写本的编目和转写工作也在进行之中。在写本整理工作之外,他也致力于考古研究,这也是出版新疆的梵文医学文献所引发的。他写了《新疆的历史和地理》(“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istans”, 1922、1930)、《古代新疆的织物》(“Textilien im alten Turkistan”, 1936),以及关于新疆南部所发现的佉卢体(Kharoṣṭhī)文书的文字和语言(1936)。

④ 指20世纪——译者注。

⑤ 有关此二人的生平,参见由瓦尔特施密特撰、刘震译《勒考克与格伦威德尔追思》,《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303~309页——译者注。

多年以来时断时续地,通过对微小得不能再微小的写本碎片的细致的研究,他还试图重构一部佛教格言集——《出耀经》(Udānavarga)。这个文本编辑的前期工作已经由他完成,现在只是等候有人来结束它<sup>⑥</sup>。

1930年前后,吕德斯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在普鲁士科学院和德国东方学会的带头人地位,使其在很多国家成为德国的象征和德国科学界的领袖。英—印政府高度评价了他在碑铭领域的工作,《印度碑铭集》(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中的一册即将问世,他们再次把出版任务托付于他,这一册中,前文提及的“列表”所列之数百个碑铭亟须重编。它的前期成果已经部分付梓,今天成了逝者留下的宝贵遗产。同时,带着[英—印政府]这一光荣的使命,吕德斯欣慰地看到了他曾经计划的《摩诃婆罗多》新修本的问世,而且是在印度本土,他的学生苏克唐伽尔(V. S. Sukthankar)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团队进行了这一项艰巨的工作。老师[所教授的]校勘准则现在得以实现,经历了艰苦的前期准备,这部巨著的第一册终于出版了。他的一个夙愿——亲访印度,也得到了实现;这个国家的文化,他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后来他又在该国做了较长时间的旅行。而后他以一个关于《古代印度的真理的魔力》就职演讲,就任柏林大学校长一职(1931/1932年)。

退休(1935年)之后,这位学者的[生活]趋于平静。1939年为他庆祝了七十寿诞。由于战争而拖延了一年,1940年出版了《印度语文学:同仁、朋友和学生们于1939年6月25日为海因里希·吕德斯七十寿诞所作之祝寿文集》(Philologica Indica, Heinrich Lüders als Festgabe zum 70. Geburtstag am 25. Juni 1939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 Freunden und Schülern)。这本文集遴选了他散落在各处的短文,有些很久就没有再版了。它们被收录于一册之中,阅读非常方便。单这一册书就证明了作者在印度学领域的博学多识。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一篇重要论著《古代印度的骰子游戏》(“Das Würfelspiel im alten Indien”)的重印版,以及一系列考据学研究、同源学和碑铭学文章,夹杂着涉及印度戏剧史、图像学和考古学的文化史探讨。例外可以感受到他令人惊叹的知识面,他同时涉足那么多领域,其深度又是旁人所无法企及的。在最后的几年里,吕德斯仍在努力完成一些细小的工作。在《德国东方学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发表的《化妆:关于印度戏剧史的一点贡献》(Nepathya,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indischen Theaters)、“从印度动物[说起]”(Von indischen Tieren)等等。最后一个比较大的贡献是他在东方学论文系列(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中发表(1941年)的著作《巴尔胡特和佛教文学》(Bhārhut und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数十年来,一部多卷本书籍的写作计划一直萦绕于其心,他满怀热忱地将之付诸笔墨。这部作品探讨的是以伐楼那(Varuṇa)为中心的《梨俱吠陀》(Rgveda)的一些问题。这部部分付印了的、有关印度雅利安最受崇拜的神祇的遗稿,只有关系密切的学生和朋友圈知道其意义所在。

⑥ 贝尔恩哈特(Franz Bernhard)于1965~1968年编辑出版了《出耀经》(Udānavarga),1~2册,“发现自吐鲁番的梵语文献”(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第10辑,“哥廷根科学院论文集”(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第54——译者注。

如此便是这位大师,精神抖擞、永不停息,终老于事业,尽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疾病时不时地将他拖离工作。然而他,充满了生命和创造的激情,总是一再地回到写字台前,从他的知识宝库中捡起一颗新的珍珠。在其七十寿诞时,我们曾真诚地祝愿他能历经“一百个秋天”,可惜未能如愿。我们深切怀念这位尊敬的师长和朋友,他的逝世是我们无可挽回的损失。他留下的著作和遗产,对我们来说是无价的。

## 埃米尔·西格(Emil Sieg)

1951年1月23日,印度学退休教授、德国东方协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的名誉委员埃米尔·西格(Emil Sieg)博士在哥廷根(Göttingen)逝世,享年85岁。

1866年8月12日,这位乌克马尔克(Uckermark)的磨坊主和地主的儿子,诞生在安格蒙德(Angermünde)附近的布莱腾泰希(Breitenteich)。1885年,在普伦茨劳(Prenzlau)的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Berlin),学习古典学。其间,他离开柏林去往蒂宾根(Tübingen)和慕尼黑(München)作短期访学。在后者,他投入恩斯特·库恩(Ernst Kuhn, 1877~1917年在慕尼黑任教)——“库恩杂志”(Kuhn's Zeitschrift, 下文作KZ)的创办者阿达尔伯特·库恩(Adalbert Kuhn)门下学习梵语<sup>⑦</sup>。1888年,他回到了柏林,1891年7月31日,西格博士毕业,其博士论文是一篇有关吠陀文献的语音的作品,用拉丁语写就,题为《婆罗堕婆阇之学,第一部分》(Bhāradvājasikṣā, Pars prior),1892年在柏林出版了其修订本《婆罗堕婆阇之学——拉丁译文与评论、批语和注释选》(Bhāradvājasikṣā cum versione latina, excerptis ex commentario, adnotationibus criticis et exegeticis)。

该作品敬献给了他在柏林的老师韦伯(Albrecht Weber, 1825~1901)。韦伯或许是19世纪下半叶最为博学的印度学家,他以柏林梵文写本目录、《白夜柔吠陀》的合集、第一部印度文学史,以及《印度巡礼》(Indische Streifen)和《印度研究》(Indische Studien)的作者与编者而著名。韦伯在语言学、文学和宗教学皆有造诣,是西格进入印度语文学(indische Philologie)领域当仁不让的引路人,当时该领域还鲜有人问津。从他那里,在新领域的开拓、未知事物的探索,以及将此转化为可靠知识方面,西格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其日后研究的动力。除韦伯之外,还有比之年轻近30岁的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自1876年起在柏林教授比较语言学,成了西格在印度日耳曼语言学领域的老师。

在柏林,西格也听过奥登贝尔格(Hermann Oldenberg)、道伊森(Paul Daussen)和



⑦ 该杂志全名为《印度日耳曼领域的比较语言杂志》(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auf dem Gebiet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由库恩于1852年在哥廷根创办——译者注。

盖尔德纳 (Karl Geldner) 的授课, 在其博士论文里, 他们也同样被称为其老师。奥登贝尔格以其重版多次的著作《佛陀: 他的生平、教义和僧团》(*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und seine Gemeinde*, 1881年) 而闻名, 还有其所编辑的、与前者几乎同时问世的、五卷本的 (巴利)《律藏》(*Vinayapitaka*, 1879~1983)。其间, 他 (指奥登贝尔格) 在柏林获得过副教授 (Extraordinariat) 的头衔, 1889年, 他离开柏林, 赴基尔 (Kiel) 担任正教授 (Ordinarius)。几乎在同时, 道伊森以其《吠檀多体系》(*Systeme des Vedānta*) 在柏林通过了哲学系 (印度哲学方向) 的教授资格考试之后, 也来到了基尔, 担任那里的哲学系正教授。对西格来说, 最后要提的那位更加重要, 那就是罗特 (Rudolph Roth) 的学生, 盖尔德纳。1875年, 他在蒂宾根博士毕业, 1878年, 又在该地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 1889年, 作为奥登贝尔格的继任者, 他来到了柏林。1887~1889年, 他在哈勒 (Halle) 担任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 其间与该地的正教授庇歇尔 (Richard Pischel) 交往甚密。在完成阿维斯陀 (*Avesta*) 的新版本 (1886年第一册) 之后, 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吠陀研究。与庇歇尔一道, 在1889年出版了《吠陀研究》(*Vedische Studien*) 的第一分册。在此书中, 他们二人系统地与一种当时流行的、备受其师罗特所推崇的吠陀研究的风气 (对抗) 以西格自己的话来表述, 这两位学者主要针对四种纰漏或疏忽: “1. 针对忽视印度传统和同经典梵语之间过少的联系 (罗特及其门生), 2. 针对语言学解释方法的过高评价, 以至于将吠陀从印度文学中剥离, 与印度古代史分开 (德尔布吕克 *Delbrück*、格拉斯曼 *Gassmann*), 3. 针对《梨俱吠陀》(*Rgveda*) 古风的夸大, 由此人们将其产生年代移至印度日耳曼的史前时代, 并将其文化描述为原始民族的文化 (缪勒 *Max Müller*、惠特尼 *Whitney*、布隆霍夫 *Brunhofer*、茨默 *Zimmer*), 4. 针对吠陀神话中的印度日耳曼, 或者唯雅利安特征。《梨俱吠陀》毋宁是一座印度的纪念碑, 应如是理解和阐释, 而整个印度古代史的构建也应服从此目标。无论如何, 在吠陀中, 无不应诠释为非印度的。”盖尔德纳入籍被西格视为韦伯之外的另一位导师。

博士毕业之后, 1892年西格再次进入了高校, 这次是在哥廷根, 为期仅一个学期。作为印度本土语法的专家, 他被基尔霍恩 (Franz Kielhorn) 招致麾下。基尔霍恩 (1882~1908年在哥廷根任教) 在印度待过15年, 在担任普纳 (Poona) 政府学院的梵语研究主管 (Superintendent) 期间, 他去学校在班智达那里, 掌握了语法领域的高深的专门知识。班智达是当地的学者和一种高贵传统的继承者, 作为交换, 他向他的印度朋友们介绍了欧洲的文献校勘方法。正如西格在其自撰的简历中所承认, 在基尔霍恩处度过的那一个学期, 为其后来与梵语语法学家共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从中获益匪浅, 以至于他成为能够阅读和教授波你尼 (Pāṇini) 的著名注疏《大疏》(*Mahābhāṣya*) 及其再注疏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学家中的一员。在下萨克森, 基尔霍恩发现西格是一个与自己有相似研究手段的人; 因为基尔霍恩永远立足于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其出版物一直是他深思熟虑的产物, 对于其不能完全掌控的领域, 他从不涉足。在此地, 这位乌克兰人清晰的、批判的、厌恶一切表象的思想充满活力, 埃米尔·西格感到如逢知己,

在哥廷根的这一学期被视为其一生中收获极为丰厚的一学期; 虽然工作量很大, 但也充满了年轻人的冒险精神, 这在我们的时代像失乐园一样。明显地, 他应该讲述过有关哥廷根当时的状况、有关其同学, 以及他与吕德斯 (Heinrich Lüders) ——这位未来的哥廷根编外讲师相与颉颃, 令西格颇为自得的是, 他在慕尼黑将吕德斯争取过来学习梵语。

当西格回到柏林——他心灵的第一故乡, 因见解相同, 这位受训于本土语法家 [体系] 的年轻学者对盖尔德纳的影响极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基尔霍恩有目的地将印度学术传统应用在其工作领域上, 其所取得的成果促使了前面提到的吠陀研究新方向的生产。这难道不是类似研究在吠陀领域的重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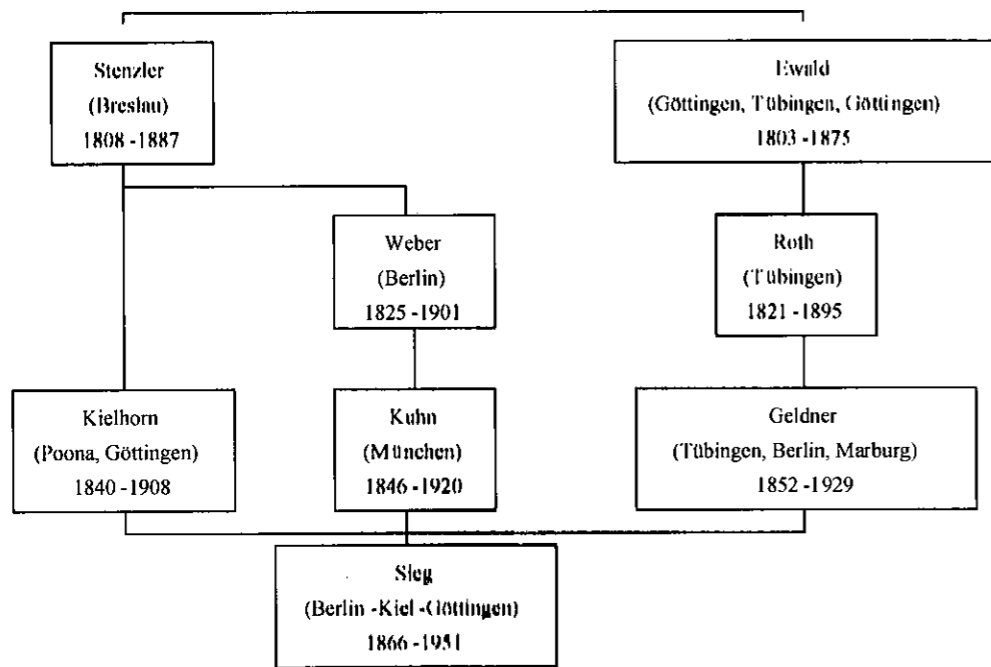
在盖尔德纳的感召下, 西格主要从事吠陀研究, 并加入了探索吠陀迷宫新路的勇敢的先锋队, 这已通过其博士论文做了充分准备。在盖尔德纳的鼓励下, 1896年西格在柏林完成了其教授资格考试论文。该论文在四开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800多页, 保留在其遗物中; 晚期吠陀对《梨俱吠陀》传说素材的注释和其他文学报告, 他进行了汇编与分析, 而后做了一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样本”。一部分材料在西格于1902年出版的作品《〈梨俱吠陀〉和印度故事传统的传说素材》(*Die Sagenstoffe des Rgveda und die indische Itihāsatrādition*) 修订并刊布。在前言中, 他将盖尔德纳称为其“极为尊敬的老师”和他的集子的发起人。温迪许 (Windisch) 在其《梵语语文学史》(*Geschichte der Sanskrit-Philologie*) 中言到: “西格之所长并非在充满幻想的推断, 而是在对传统的策略性的运用,” “西格的作品……证实了古代传承的价值, 并让人认识到其演变——旧的成分亡佚, 新的产生。”此作品原本被西格设计为第一册, 但之后却并未接续。其所达到的成就或许未能与盖尔德纳对他的殷切期望相符。尽管如此, 那一份由盖尔德纳植入的、对吠陀题材的热爱, 仍然保持了他的一生, 并再传给他的学生, 以及在他的出版物中一再回归这些题材, 即使他多年羁縻于其他事务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梨俱吠陀》I. 161的论述 (*ZII*, 第五辑, 1927年, 203~239页)、《〈梨俱吠陀〉中的因陀罗与苏摩劫》(“*Indra und der Somaraub nach dem Rgveda*”), 《雅各比祝寿文集》(*Festsache H. Jacobi*, 1926, 228~239页) 和在《哥廷根科学学会 (后为“学院”) 通讯》(*Nachrichten der Götting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中的两篇文章: 1923年的《吠陀观念中的太阳夜途》(“*Der Nachtweg der Sonne nach der vedischen Anschauung*”), 其中他以自己的言说“证明, 吠陀的世界观与佛教和经典梵语文学中的大相径庭”, 1928年的《〈梨俱吠陀〉中的太阳赛跑》(“*Sonnenrennen im Rgveda*”) 是一个出于“他旧时的热爱”——《梨俱吠陀》的传说素材的问题<sup>⑨</sup>。

在本世纪初, 在前述吠陀研究很久之前, 西格在柏林开辟了崭新的、无法预料的发展空间。彼时, 1903~1914年之间, 在格伦威德尔 (Albert Grünwedel) 和勒考克 (Albert von Le Coq) 的率领下, 民族博物馆进行了四次普鲁士赴中亚的考察活动, 对塔

⑨ 参见《印度伊朗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下文作 *ZII*) 第7期, 1929年, 3页, 他为盖尔德纳所撰之追思文。

⑨ 还应提起的是, 哥廷根的学术通讯中有一些由他所撰的书评: 1925年, 129~135页, Walter Neisser的 *Zum Wörterbuch des Rgveda*, 1930年, 21~25页, Alfred Hillebrand的 *Vedische Mythologie*, 第二版; 1930年, 83~90页, W. Caland的 *Vaiṣṇavasamāsātra*。

埃米尔·西格的师父与师祖



里木盆地的北缘地区作研究。他们的成果令人惊叹，大量的考古材料被携回，诸如壁画、塑像和各种小的物品，其中有用或多或少知晓的文字和语言写就的无数件写本。一个被尘封的世界、公元后一千年的佛教西域，呈现在学者眼前，并期待进一步的研究。尽管大部分写本非常破碎，在底歇尔和韦伯在柏林的继任者率领之下，一些柏林的学者勇于承担起解读工作，其中埃米尔·西格接手了用所谓的中亚婆罗迷——一种源自印度的字体书写的写本的研究任务。1907年在《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以下称 SPAW) 中，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他的文章立足于基尔霍恩学派，题为《在中国西域的胜金口所发现的梵语语法残片》(“Bruchstück einer Sanskrit-Grammatik aus Sügin-Ägiz Chinesisch-Turkistan”), 第二年又接着发表了第二篇论文《在中国西域新发现的梵语语法残片》(“Neue Bruchstücke der Sanskrit-Grammatik aus Chinesisch-Turkistan”).

在其致力于发现自西域的语法梵文研究期间，西格在他过去的学生威廉·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协助下，处理过一组婆罗迷文的写本，它们因为一些特别之处而引人注目。这些文本的婆罗迷字还带有一定数量的变异了的，或者新发明的字符，即所谓的陌生字母，它们在梵语未曾出现过。该语言被罗伊曼(Ernst Leumann)命名为“非雅利安语”(Unarisch)，被某些人视为蒙古语或古代突厥语，一开始无人能理解，直到西格和西格林在一些双语写本中找到了可靠的切入点。1908年这两位学者向《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ungsberichten der Berliner Akademie) 提交了引起极大轰动的论文《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的语言——关于一种至今未知的印度日耳曼文学语言的临时注

释》(“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ä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他们提供了不可推翻的证据，证明了这一新的语言起源于印度日耳曼语，甚至是印欧语的旁支，与其说是一种印度雅利安语——一种“唃类(satem)语言”，还不如说是一种“魁(centum)类语言”；此外，它有两种方言之别，暂名为吐火罗语 A 和 B。

因为吐火罗文献几乎只有印度语言的译本，并且带有许多梵语借词、与佛教文学有关，所以对印度学家来说，自从第一个突破口打开之后，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有助于理解全文的立足点。时而此处，时而彼处，解读者获得了新的密钥，并且通过耐心的汇总和大胆的组合——如果万不得已，逐渐揭开该语言的结构和词汇的面纱。

现在，外界的认可也不再远离西格。在 12 年的编外讲师生涯之后，在柏林，1909 年，他获得了来自基尔的梵语和印度日耳曼比较语言学正教授的聘书。因为奥登贝尔格拥有那里的教席多年，1908 年他去往哥廷根，而在奥登贝尔格过世(1920 年)之后，西格又即刻到哥廷根继任，在那里他找到了第二故乡、最优秀的学生和他最后的归宿。在那两所大学里，这位勤于静思、心无旁骛、淡泊世务的学者享受着同事们的尊重与信任，以至于在动荡的年代里，那些困难的、重要的岗位皆委托给了他。1918/1919 年他任基尔大学的校长，物价飞涨的 1923 年他在哥廷根担任哲学学院院长。他能够谨慎周到地防止与缓和冲突。就职哥廷根仅一年，他便当选为当地的科学院院士，而后(1942 年)成为柏林普鲁士(今德国)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院士。

现在仍然回到他在吐火罗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在 20 世纪前二十年，西格与西格林一同主要从事方言 A 研究。A 方言的故地在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考察区域的东部，在喀喇沙尔(Qarašahr)地区。特别地，这一方言的语言残余只存在于柏林所藏的写本，而方言 B 的残卷也能为俄国、法国、英国的考察队所获。方言 A 的所有残片的编辑本很快在 1908 年之后着手并交付排印，但在 1915 年不得不暂停，因为他的合作者西格林从军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合作者被军队掠去，西格一个人刊布并翻译了方言 A 的最初的两个文本试样。其一于 1916 年发表在《库恩祝寿文集》(Festschrift für E. Kuhn) 内，第 147 页起。它是《吐火罗语本的造狮者故事》(“Die Geschichte von den Löwenmachern in tocharischer Version”)。其二《吐火罗语本的机工与画师童话》(“Das Märchen von dem Mechaniker und dem Maler in tocharischer Fassung”)在《夏德祝寿文集》(Festschrift für Hirth) 内，《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第八辑，第 362 页起。战争结束后，编辑本继续付印。在古鲁伊特(Gruyter)出版了题为《吐火罗语言残余》(Tocharisch Sprachreste) 的著作，两卷本；音写(Transkription)及所附的图版。另外还有每件残片的内容概要。应该想到，基于相关词语分析的音写，是以对该语言更深入的了解为前提的；在取得如此出色的成就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对方言 A 中的所有材料系统的语法整理。作为这项工作的结果，1931 年，他与柏林的印度日耳曼学家舒尔策(Wilhelm Schulze)合作，出版了长约 500 页的《吐火罗语法》(Tocharische Grammatik) 这部巨著，它将研究结果作了彻底阐明和梳理。西格与其合作者并不急于作出判断与轻易

的假设,他们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表明,比较语言观察被有意地舍弃了。该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并非散布在此处或彼处的语言组合,而是牢牢掌握的事实,这些事实,就像它们的文本编辑,也保证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在完成 A 的语法之后,西格和西格林又整顿旗鼓,将更多精力转而投入方言 B 的研究中去。A 方言区域以西,在库车(旧称:龟兹),公元 5 世纪之后所操的方言,之前只有柏林所藏的一叶写本被刊布过,1925 年,《缪勒祝寿文集》(Festschrift für F. W. K. Müller),《东方》(Asia Major) II, 第 277 页起:《成道前菩萨的饮食》(“Die Speisung des Bodhisattva vor der Erlöschung”)。与之相对,法国伟大的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在印度日耳曼学家梅耶(A. Meillet)的支持下,早在 1912 年间就刊布了一些巴黎的伯希和(Pelliot)写本和伦敦的霍恩勒(Hoernle)写本中的 B 文献,认为方言 B 并无特殊。列维由此成为一名在公开场合领先西格的对手,这两位竞争对手进行了多次论战。他们的特点各不相同。列维会迅速地处理手中的文本编辑并得出结论,还擅长与汉文对照。而他对佛教文学更宽广的视野,西格与西格林得以时不时地关注那些他们无法顾及的相关文献。这两位德国人过于缓慢的工作方式令他恼火,依其所见,材料在研究状态中滞留太久。对于吐火罗语方言 B 的命名,他仅接受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后即想以“库车语”(Langue de Koutcha)代之<sup>⑩</sup>。西格与西格林的语言命名以缪勒为依据,1907 年,在德里《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为题回鹘文献时,他在题记中发现,该文本先从印度语言译成吐火罗(Tochrī)语,而后再转译成回鹘文<sup>⑪</sup>。因为这部作品先存于西域的写本中,并在回鹘文和这一新语言中皆出现过,人们相信,后者可以称为吐火罗或吐火罗语。另外,勒考克在供养人图像中的发现也可能对此有影响。发现了很多写本的库车佛教石窟中,除宗教壁画之外,还有供养人的图像,他们的衣服和武器无疑同印度—斯基泰人的服饰相类。这类服饰我们从印度的造像,比如迦腻色迦(Kaniska)像中可知。另一方面,操这一新语言的人与印度—斯基泰人作同一认定,对此人们持异议,因为根据现有资料,后者存在于公元前后,而吐火罗国为古代的大夏,这些被讨论的写本却源自东方的中国西域,属于公元 6~7 世纪。1916 年西格在《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中与缪勒一道,在题为《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语》(“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的章节中,首次提出了吐火罗语之名。他们两人确信,回鹘人将此新语言称作了吐火罗语,回鹘语中,纯粹的吐火罗借词和转化为吐火罗语发音的梵语借词证实了回鹘人与操吐火罗语者之间的密

⑩ Note préliminaire sur les Documents en Tokharien de la Mission Pelliot, *Journal Asiatique*, Vol. 17, 1911, 138-140; Étude des documents Tokhariens de la Mission Pelliot, *Journal Asiatique*, Vol. 17, 1911, 441-449; Une légende du Karuṇā-Puṇḍarīka en langue Tokharienne, *Festschrift V. Thomsen*, 1912, Leipzig, O. Harrassowitz 155-165; Un fragment Tokharien du Vinaya des Sarvāstivādins, *Journal Asiatique*, Jan.-Feb. 1912, Vol. 19, 101-111. Meillet, A. Les Noms de Nombre en Tokharien B,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Vol. 17, 1911-12, 281-294. S. Lévi, Tokharian Prātimokṣa Fragmen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13, 109-120. A. Meillet and S. Lévi; Remarques sur les Formes grammaticales de quelques Textes en Tokharien B,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Vol. 18, 1913, 1-33; 381-423.

⑪ S. Lévi;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11. Ser. Vol. 2, 1913, 311-380.

⑫ Beitrag zur genauer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en Sprachen Mittelasiens, *SBAW*, 1907, 958-960.

切关系。两年后,西格又有了新的发现。在一篇文章《吐火罗语的本地名称》(“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chrī”)中<sup>⑬</sup>,他证实,Ārsī 一词作为操此语言者自己对吐火罗语所使用的称呼。由此,方言 A 可能为回鹘人称之吐火罗语(Tochrī),为当地人称作 Ārsī。在此结论之后,争论归于平静,直到 1936 年剑桥的印度伊朗学家贝利(H. W. Bailey)重拾这一问题<sup>⑭</sup>。他试图去除这一专用名 Ārsī,因为他将它解释为梵语 ārya 一种中亚形式。由此,从 Ārsī 语(ārsī-kāntu)可以得出梵语 āryā-bhāṣā<sup>⑮</sup>。同时,贝利提议,根据吕德斯在梵语文献中的证据,喀喇沙尔(Qarašahr)旧称“焉耆”(Agni),方言 A 称为“焉耆语”(Agnean,梵语 agneya)。方言 A 和 B,东部的称为焉耆语,西部的称为龟兹语,如此遥相呼应。西格随即(1937 年)以《仍旧是吐火罗语》(“Und dennoch Tocharisch”)应之<sup>⑯</sup>,其中他检视了所有的带有 Ārsī 的文句,并证实了该词确为专用名词。结尾处他建议,“回鹘语题记给予其合法性,引入[二手]文献中已经有 30 年了”,吐火罗语这一名称应予以保留,并且可以统称两种方言。纯粹实用性的理由是,人们不再愿意取消一个使用广泛的名词,这也符合了西格的建议。或许那个由亨宁(W. B. Henning)所用的形式“伪吐火罗语”(Pseudo-Tocharisch)将逐渐推行<sup>⑰</sup>。

对西格来说,他所致力命名问题似乎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主要旨趣在于研究和发掘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激烈批评了列维于 1933 年所刊布的一个 B 文本的更大的集子,该集子以《库车语文献残卷》(“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为题,并带有翻译和索引。他发现,音写和翻译既未能体现 20 年前列维与梅耶所达到的水平,同西格林和舒尔策其间所达到的理解程度相去更远。由于他对更多材料有了更透彻的掌握,在他的《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库车语〈业分别〉文本》(“Die Kutschischen Karmavibhaṅga-Texte der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Paris”)一文中<sup>⑱</sup>,他重新整理了[列维的]“残卷”(Fragments)第 85 页起的篇章,并用 54 页的篇幅彻底作了全新的解释。

作为他们在柏林 B 文献上的第一个较大的成果,西格和西格林整理了著名的佛教格言集——《出耀经》(Udānavarga)译成吐火罗语的注释,这是一个篇幅巨大的残卷。这个形式为艺术诗歌的注释,以《嘉言庄严》(Udānāṅkara)为题,他们作了转写以及翻译和索引,行将完成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于 1939 年爆发了。时局使得哥廷根与柏林之间的合作愈发艰难。西格(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再次单独工作,并投身到 A 文献较长片段的翻译中去。没有西格林的合作,1943 年的《柏林科学院论文》(Abhandlungen der Berliner Akademie)发表了第一部分,以《吐火罗语译文 I》(“Ü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 I”)为题。1946 年西格林去世。他的辞世对西格的打击非常大,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超过 40 年的友谊扼腕而终。他们两人幸福的合作关系——西格的勇往直前,加上西格林的小心谨慎,这通常成为有效的制动闸——被破坏

⑬ SPAW, 1918, 560 页起。

⑭ “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8, 1936, 883-921.

⑮ 意为“圣语”——译者注。

⑯ SBAW, 1937, 130 页起。

⑰ *Asia Major*, New Series I, Part II, 158 页起。

⑱ KZ. 65 册, 1938, 1~54 页。

了,西格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时间紧迫。柏林科学院为他雇了一名女秘书,后来为一名助教托马斯博士(Werner Thomas)所取代,这为他带来了很大的帮助。B文献的修订现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A文献一样,出版B文献合订本,西格看到了这项长期搁置的计划行将成为现实。前面提及之战前基本完成了的《嘉言庄严》文本、译文和非常翔实的索引,作为《吐火罗语言残余,语言B》(*Tocharischen Sprachreste, Sprache B*)的第一分册,以西格和西格林为名,由范登霍伊克与鲁普莱西特公司(Vandenhoeck und Ruprecht)于1949年在哥廷根出版。在他去世时,本应作为接下来的两个分册的B文献的合订本,只需要将手稿再作修订并誊写清楚即可。确实,西格在最后的时刻完成了方言A译文的第二分册。

此外,另西格满足的是,在与列维论战之后,国外的研究者也逐渐承认了他胜人一筹的知识和能力。在根特(Gent)的库弗尔(Couvreur)教授,虽师承法国学派,但在其最后15年里多次前往哥廷根,包括1950年夏天,为的是向西格求教和与之共事。他是西格学派在国外最好的维护者。1948年,比较语言学家莱恩(G. Lane)教授也特意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前来欧洲与西格共事。如此,这位逝者为提高德国学术地位默默地作出了贡献。

当这位德国印度学界年高德劭的长者,在去世前几周刚刚被授予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的荣誉会员证书时,他敏以答谢道:他有幸得以如此高寿,以至于能完成一桩像样的工作。对名利的淡泊使他卓尔不群。以如此言语形容其谦逊的态度毫不为过——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但愿这种皓首穷经的学人相礼了的典范,在我们中间作为榜样永存!

## The Memory of Heinrich Lüders and Emil Sieg

Ernst Waldschmidt (tr. Liu Zhou)